

谢 泳 著

学人今昔

学人今昔

○求索文丛

CHANGCHUNCHUBANSHE

◎ 長春出版社

外行与内行

不读女人写的散文

晚年贺麟 汤用彤写序

谁来当大学校长

失去的好传统

陈梦家有一首诗

线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

沈从文：幸亏没写小说

一个人一本周刊和一所大学

过去的大学生辩论

陈梦家有著名作家要敢说真话

沈从文：到底要什么

叶企孙饶毓泰的死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杨树达的屈辱

尹达的学术道路

学会道歉

是恩怨的学术转向

陈垣的转变

论战的规则

吴光旦的一篇文章

顾颉刚的恐惧

叶企孙饶毓泰的顾虑

周一良：汤用彤的顾虑

杨树达的屈辱

尹达的学术道路

学会道歉

是恩怨的学术转向

论战的规则

吴光旦的一篇文章

顾颉刚的恐惧



0838178

谢

泳

著

○求索文丛



学人今昔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10号

学人今昔

谢泳著

责任编辑:邓进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7年8月第1版

印张:9 插页:5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145 000

印数:1—8 000册

ISBN 7-80604-600-3/I·125

定价:14.00元

序

言

谢
泳

许久以来，我一直对旧学者的变化感到难以理解。因为我在做《观察》研究和西南联大研究时，从旧期刊上读到过很多学者的时论。把他们当时的想法和日后的选择对比一下，我很吃惊，因为这二者之间，大体可以说是背反的。过去那些旧学者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在50多年以后再看，我觉得他们是不糊涂的，但理论上不糊涂，不等于行为上不糊涂。带着这样的感触，我在做研究之余，很花了一些时间去读旧学者的日记、回忆录和年谱，我想从这些第一手资料中看出旧学者的苦闷和不适应，尽管这样的资料很有限，但如果我们将他们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也就可以从点滴的资料中见出旧学者的内心世界。他们曾经是很有生气的一群，后来各有各的选择，各有各的活法，后人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他们，能走进他们内心多

少，是很难说的。但我始终有这样的愿望，想尽可能缩短后人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我知道这种努力对于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仅仅是迈出了微小的一步，但这种努力的意义在于：每一个试图这样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他至少是良知未泯的人，他知道一个民族的苦难最终是要体现在生活在那里的切人身上的，当然也就包括这些读书人。

新时代里的旧文人，可能是一部漫长的历史，我与在这个时代里的旧学者早已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了，但文人学者的好处是他们多少都留下了文字，我只想从这文字中读出我自己的感想，也许这感想不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真实感受，但至少是我这个晚辈从他们苦难的经历中悟出的一点点中国经验。我对所了解的这些旧学者有一种天然的敬意，不管他们在政治上持何种见解，这些学者在学问上都无愧于中国读书人的称号。对这些旧学者的学问，我也不了解，或者说只在常识的层面上了解一点，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坎坷的人生经历和最终命运。

说实话，我是先存了这些旧学者内心一定苦闷这样的直觉，才去试着从他们的日记和回忆录中验证这一直觉的，使我稍感安慰的是我从他们的笔下确实得到了我所想得到的那些东西，陈寅恪、吴宓就不用说

序 言

了,从杨树达、顾颉刚、吴恩裕、钱钟书、汤用彤等人的点滴回忆中,我也多少看到了一点他们的不适应。如果读者能从我的这些杂乱的感想中,稍微停顿下来,想一想一代知识分子的处境,那我的努力也就算达到了。

1997年5月14日
于山西太原市南华门东四条

目 录

学人今昔

- 金岳霖的理想和无奈 / 3
杨树达的屈辱 / 10
叶企孙饶毓泰的死 / 16
汤用彤的顾虑 / 19
汤用彤写序 / 23
陈垣的转变 / 26
顾颉刚的恐惧 / 31
晚年贺麟 / 37
吴恩裕的学术转向 / 44
失望的王芸生 / 49
周一夏：毕竟是书生 / 60
尹达的学术道路 / 65
王瑶曲折的学术道路 / 72

目 录

学
人
今
昔

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 / 78

文化杂言

一个人一本周刊和一所大学 / 87

普及梅贻琦 / 93

谁来当大学校长 / 95

两首校歌 / 97

你一定要读这本书 / 100

过去的大学生辩论 / 102

为什么怀旧 / 105

失去的好传统 / 108

沈从文：幸亏没写小说 / 110

希望有本好杂志 / 112

陈梦家的一首诗 / 115

钱钟书与西南联大 / 118

目 录

- 钱钟书与胡适 / 112
- 储安平与《观察》丛书 / 125
- 储安平的《英国与印度》 / 127
- 竺可桢与《观察》 / 129
- 常风《逝水集》出版前后 / 132
- 你到底要什么 / 136
- 著名作家要敢说真话 / 140
- 反认故乡是他乡 / 144
- 不读女人写的散文 / 149
- 做大学问与弄高职称 / 154
- 自欺欺人 / 157
- 什么文化养育了他们 / 159
- 论战的规则 / 162
- 做人的底线 / 165

目 录

学
人
今
昔

- 背景的意义 / 168
- 学者的道德 / 171
- 不该忘记 / 173
- 杂文的忧虑 / 175
- 该修订的没有修订 / 177
- 学会道歉 / 179
- 互相理解 / 181
- 外行与内行 / 184
- 不能乱比 / 186
- 你有多少外文书 / 188
- 旧书店 / 190
- 听来的故事 / 193
- 学生的气质 / 196

目 录

学
人
今
昔

- 买到一本朱自清的书 / 199
- 陈寅恪的固执 / 202
- 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 / 205
- 傅斯年延安之行细节辨正 / 210
- 历史回声**
- 《观察》五十年 / 215
-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 / 237
- 西南联大与汪曾祺、
穆旦的文学道路 / 247
- 魁阁：
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 / 261
- 后记 / 278

学人今昔

金岳霖的理想和无奈

* * *

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冯友兰和金岳霖的人生道路都很漫长，经历了许多历史变幻。冯友兰的命运，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许多启示，这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我曾写过一篇《晚年冯友兰》，说了我对他的理解。我对冯先生的学问是门外汉，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经历。我想从他的经历中看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人生。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同样面临不适应，这时决定一个知识分子选择的动力是什么？过去的理想、文化的传统能起多大作用？也许这是难以说清楚的。但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说，也容易找到相应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个性这东西，有时候和信仰和传统是分裂的。在环境压力下的知识分子，信仰和传统的力量有时会很快消失，生存的力量是决定性的。像冯友兰在文革中的转变，从他早年的行为中也能找到相应的依据。台湾马逢华曾说过当年他和萧公权闲聊，说起清华旧事，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

Whatever Daisen Says, it goes;
Whatever it goes, Chisen Says.

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马逢华《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传记文学》52卷6期）。虽是学林掌故，但我们却能从细微处见到一个知识分子的个性。面临同样的历史巨变，冯友兰和金岳霖的转变有点类似。1974年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咏史二十五首（并序）》，这些诗明显留有当时的历史痕迹。《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有“金岳霖来信，称赞《咏史诗》”的记载（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52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可见金岳霖当时的思想状况。

金岳霖的道路，和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一样，都是早年清华，然后留美，回国做大学教授，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这个态度简单说就是“参政意识”。金岳霖的专业懂得的人不多，他当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是首屈一指的人物，1948年他曾和冯友兰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它是当时一个学者的最高荣誉。金岳霖曾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政治不感兴趣，不等于对

*

政治没有见解。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数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但同时他们又都对政治保持有热情，金岳霖曾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过名，对学生运动，他也和多数大学教授一样，有自己一贯的看法。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5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一个教授当年的风范给学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见金岳霖的精神魅力。但同样一个金岳霖，在后来却突然发生了变化。他的学生王浩曾说，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3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底以前。“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对此王浩的评价是“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

绩”（《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第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他先后参预了对杜威、胡适和罗素的批判，参预了对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的批判。这个被他的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人，突然转变了。他的转变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人们对他的选择也许已不再苛求，但如何评价这种选择，从这种选择中能看出什么东西，却是不容含糊的。王中江在《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中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说：“对他五十年代以前的哲学的片面的批判和否定，使我感到愤怒和痛苦。对此，金到底是如何感受的，我们已不能详细得知了，但我忍受不了。从理智上，我同情他，一心想为他的所为作出辩护，把他个人的悲剧性失误，转换成同时代的悲剧性曲折；但是，从感情上，我不能原谅他，我甚至反感他，我要求他对他自己的失误承担责任”（见该书25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金岳霖这一代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最具独立性的，但在历史巨变中，我们没有看见这种独立性。金岳霖晚年，对自己的选择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话说得很含蓄。他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解放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心明眼亮起来了，难道我反而糊涂了？”